



■ 何守俊

二十年前,踏着“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旋律,我从一名懵懵懂懂的学生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地方,迈步踏向烟草这片芳草地,开始了人生的又一个起点, 仿佛从蛮荒时代一下进入了文明时代,二十年的烟草情缘就这样开始了。

1993 年,青春作伴,风采依然,是我第一次烟草情缘的开始,她使我在数字与青春的交织中度过。每天面对的是堆积如山的单据和报表、密麻得令人头晕的数字,算盘珠子与青春的交替和财务工作自身的风险。可是每

火柴盒上的记忆

■ 齐鲁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农村非常贫穷落后,老百姓连买包火柴的钱也没有。那年我五岁,记得我们淄博一带农村,有些老年人点烟生火,很少用火柴,他们都是用火石取火代替。

那时在家里,我时常看到父亲和叔叔手握一块火石用火镰一打,它就冒出火花,火花碰在软木柴或秸秆瓢上,火就点燃了。当时我觉得很惊奇,就问父亲:“火镰和火石一碰撞怎么就起火。”父亲笑着说:“这就叫石能取火!”他打了一个比方说,我们采石头时,用钢钎向石头上一撞,石头立刻就冒出火花,它是同一个道理。听了我觉得很有意思,现在想想也有它的科学道理。老百姓都说,穷有穷的办法,穷则思变,穷会使人的头脑更聪明。

解放后,农村用火柴的人多起来,生火点灯做饭都用火柴。不过那时候不叫火柴,叫“洋火”,为什么叫“洋火”呢?因为当时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一些物品,如水泥、煤油、自行车等都带有一个“洋”字,叫洋灰、洋油、洋车,大概是说这些物品都是从外国进口的,所以冠以“洋”字。从这里我们看出那时我们国家经济落后,不能自给自足。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首先抓经济建设,自力更生建起了自己的火柴厂。我印象中在济宁、济南、益都、青岛都建起了火柴厂。火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日用品,在没有电灯、天然气之前,火柴在一个家庭中用处多多,点灯点火做饭都需要火柴。那时父亲和母亲去赶集,第一件事总是想着买一包火柴,回来做饭用。

五六十年代,火柴走进千家万户,一个家庭平均一个月要用两盒火柴,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吸烟的,那么用得更多。那些生活困难的岁月,粮食缺,生活物品也缺,火柴实行计划供应,凭票购买。那时我家有五口人,两个吸烟的,当时按户发火柴票,每户十盒,幸亏我在外地工作,有个单独户口,即便这样家中的火柴也不够用,只好向别人借火柴票。

过去的火柴头五彩缤纷,有各种颜色,像红、黄、绿、白、灰等,包装设计也格外美观大方。那时有很多人喜欢收藏火柴盒,因为在方寸的火柴盒上有不同的图案,小小火柴盒反映了时代的变迁。

我也收藏了一些。记得小时候没什么玩具,也没什么娱乐,收藏糖纸、火柴皮成为大大小小孩子们的乐趣。有些糖纸崭新的,记不清楚从何渠道而来,那些五颜六色、各种图案设计的糖纸被夹在书里,每一页夹一张。我时常拿出来翻一翻,观赏把玩。

火柴皮是从用过的火柴盒上小心翼翼地撕下来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火柴盒基本呈系列化,有的是四张一个系列。那时我为了集全一个系列的火柴皮到处寻找。我将火柴皮集中放在塑料袋里,与志同道合的小朋友分享、交流。有时大家还会以物换物,互通有无。

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打火机在我国出现,打火机凭着方便、轻巧、潮流等特点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欢迎。刚出现时,有些青年人感到很时髦,把它作为礼品送人。记得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找我玩,他知道我吸烟,就送给我一个打火机。那个打火机外壳很漂亮,我一握,“啪”的一声就打着了,发出的火花是绿色的,使用很方便。

弹指一挥间,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社会科技有了很大的发展,火柴也在历史的烟尘中逐渐隐去,但对火柴的记忆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中……

二十年的四次烟草情缘

遨游了,那种茫然感慢慢向着踌躇满志转化,特别是从精细型管理蜕变到情与法的交织中,更是一步一趋,一笑一颦地刻录着美的足迹。蜕变初期,迎着市场的转变,在规则与创新的海域里,驾着专卖执法管理这叶小舟强凋员工对任务负责。在情与法的交织中,总是想着养育我们的人民和赖以生存的土地,每当经营户需要帮助,我们及时将管理变成服务,导入“亲情”文化,使湿润的空气变成春雨洒向人间,让专卖执法管理这支小船在“对行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这一汪洋中自由航行,越驶越远……

2005 年,我像一只漂流瓶,满怀希望和美好憧憬跨过金沙江来到玉龙雪山脚下这片美丽的土地,开始了第三次烟草情缘。在那里我的工作很平凡,仍只是一个基层普通专卖管理员,在曾经有过的很短时间的彷徨和迷茫后,责任和使命让我回归找回自我,和短暂的阵痛挥手道别。面对新的环境、新的压力,整个工作就向身旁的长江水,时而惊涛拍岸毫无畏惧,带走陈年枯朽查处违法;时而默默无语创新工作、洗涤生活,等待着下一次风暴的来临;时而窃窃私语,仿佛江水对河床说“你是我的依靠”、又仿佛河床对江水说“你是我的所有”。在情与法的交织下,这次烟草情缘,使我在平凡的生活、工作中,就像长江水一样,足迹踏遍高山,深情浇灌着大地,她使

当处理完一笔业务、计算出一笔税款和利润的时候,青春就随着税款和利润到了她该去的地方,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特别是经过几天才从大堆的单据、数据中查找出 1 分钱的表间不平衡原因时,付出的艰辛顿时变成了快乐。

时光流逝,岁月如歌。1999 年我从一个熟悉岗位到一个陌生岗位,以烟草专卖执法管理结伴而行,在茫然和踌躇中再续第二次烟草情缘。面对茫然,宛如在一张白纸上涂鸦,不知如何定格,但一想到“把 5%的希望变成 100%的现实”,就知道如何在“对行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社会负责”这一汪洋中

周恩来的抽烟哲学：谈判时必须抽

■ 新华

在电影《建国大业》中,有一个周恩来抽烟的镜头:周恩来在焦急地等待东北辽沈战役前线消息时,特意从警卫员手中要了一支烟,熟练地抽了起来。但周恩来的亲属和他生前的身边工作人员,则无一例外地表示:周恩来一般是不抽烟的。

周恩来不抽烟,一是周家几代人中很少有人抽烟,二是在他任天津南开学校读书时,该校有一条校规:学生不许抽烟。据天津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的同志说,南开学校在执行这条校规时还出现过风波。原来校长张伯苓先生会抽烟,于是,学生们就联名上书给张校长提意见:“你不让我们抽烟,但你身为校长,为什么带头抽烟呢?”张伯苓就在一次学校集会上,当场把手中的烟掐灭,对全体学生说:“以后我如果改不了,就不配当你们的校长,也没资格管教你们!从今天开始,我们互相监督,决不抽烟!”打那以后,张伯苓

茶香、烟香与书香

■ 金景

从我认知起,书是最优秀的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也是心里辅导老师,更是理财师和情感分析师,也是可靠的朋友,美味的饭菜。随着年龄的增长,批判能力的增强,学会分析问题了,随着工作压力的加大,读书机会也越来越少了。从青年时代到现在,一杯茶、一包烟、一本书就变成了我生活中的必需品。不同季节喝着不同的茶、吸着带点劲的烟,看一本好书基本成为周末的节目。

春季,万物复苏的时节,我会泡上一壶张一元的花茶,抽上一包红塔山,看点管理类、励志类、心灵鸡汤类的书籍给自己充电。为了拿个建造师之类的证书,在补习班上,克服烟瘾,一下课,便冲出课堂,跑到教室外,吞云吐雾,使大脑得到休息。晚上,做题背书,花茶和红塔山的功劳不小。

夏季,天空仿佛在燃烧。我会泡上西湖龙井,(加两块冰糖),烟依然是红塔山,看的书也大多是金庸、莫言的小说,从武侠到言情,缠绵于故事中,在《遇见未知的自己》中进行修行,在遭遇生活日复一日机械化的演出后,希望活出自己的人生。

忆父亲与“黄鹤楼”烟

■ 徐宁

一見父亲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了,可他老人家与“黄鹤楼”烟的情结仿佛就在眼前……

其实,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一生只有两个嗜好。一是喝茶;二是抽烟。喝茶只喝我们当地的绿茶;抽烟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先是只认准当时很难得的云产烟“红塔山”品牌,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慢慢地转到“黄鹤楼”品牌,其他的很少看见他抽。

印象中,父亲滴酒不沾但很爱吸烟,每天要抽一包半烟,他衣服上时常散发出淡雅香的烟草味。每次总能看见父亲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点上火,猛吸一口,又吐着烟圈,一副悠然自乐的样子。烟,对于父亲就像多年

彻底戒烟,学生中也就基本无人抽烟了。但这并不是说,走南闯北几十年的周恩来从未接触过烟,他与烟相关的故事彰显了他的智慧。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还都南京,命令国民党部队赶去全国各地接收,同时还对许多曾经投降日本的伪军头目封官许愿,对浴血抗战 8 年的八路军却下了一道“原地驻防”的命令。但由于当时他的大部队还都远在西南一带的“大后方”,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调至东南沿海、中原和东北等地区,所以就与中共玩起了“和谈”、“和平建国”等花招。美国政府派了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主持国共两党之间的调停和谈判。

每次谈判时,周恩来都带着章文晋参加。谈判时,不懂中文的马歇尔讲英语,由章文晋翻译。翻译过后,周恩来还要吸一两口烟,吐出烟雾后再回答。周恩来的回答不仅内容精辟,而且常常是一语点破、击中要害,弄得国民党方面十分尴尬,美国方面也不得



秋季,天高云淡,却也情感起伏。我会泡上乌龙青茶,烟还是红塔山,看点席慕容、琼瑶、梁凤仪的小说,芳草凄凄、绿树蔓蔓,体会其中的情与爱的悲欢离合。

冬季,一个成熟厚重的季节,我不再浪费光阴,也不再沉浸鸳鸯蝴蝶,我会来点红茶,养生,烟还是钟情红塔山,开始的历史的探究。从四书五经、到诸子百家、再到东周列

的老朋友,每天形影不离。曾经母亲跟他开玩笑说:“如果你能把烟戒了,我每天给你炖只老母鸡吃。”可他回复说:“别小看我抽烟,家里这房子从八间草房换成八间大瓦房,再换成四开间的楼房都是我抽烟抽来的。”为啥?“这建房的材料,都是因我抽烟在外结交,朋友帮忙,价钱比人家便宜好多买来的。”把母亲和我们家人都说得哑口无言。

是的,父亲以前搞推销,见识比较多,经常把外地烟带回来分发给他的老烟友。特别是逢年过节,有时整件烟买回来,然后让我们去送。那个时候,计划经济年代,什么都是凭票供应,父亲那一帮“老烟枪们”见到既不要票又很便宜的烟,高兴得不得了,感觉是多大的人情。所以,在当地我们家人办事,几乎是“路路通”,连我们这些小孩去买肉什么

我更加深爱着脚下这片饱含深情的土地。

2009 年,是我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这次转折让我踏进了第四次烟草情缘。这一年历史给了我一次摆脱无奈与迷茫的机会,离开了让我“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是非之地,站在阳光下,一声长叹,深深的烙印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这一年通过一次次的公开竞聘,终于了却多年的心愿,加盟到市局机关,带着疲惫和感恩的心在丽江烟草改革与发展的大路上挥洒激情和青春,年轻的心再一次燃烧,一晃四年有余。四年之路看似平坦实则坎坷无限,竞聘路上,名列前茅,却几经周折,征程中,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默默奉献,斐然的成绩在激昂的托词中变成真实的谎言,永远定格在“四十而知天命”。

往事越千年,过去的已经过去,留下的只有泪水和汗水浇灌过的土地。可以说,每次情缘都很平凡,仿佛就是千年修得的“共枕眠”,她从平凡中走来,在平凡中远去。在“追求、追求、再追求”的人生境界中,多少轮回、多少梦想,都伴着这二十年的足迹久久回荡;多少辛酸、多少微笑在这二十年的情缘中随着上天的宠幸洒下一片“驼铃声”,阐释着炼狱的真谛,点滴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和血”的情怀,让大地去戏说……随着闪闪流光,就让这“共枕眠”自己去经历她的命运,燃烧岁月,踏歌真诚,盘点一生!

不佩服。事后有人问周恩来:“你为什么在反驳马歇尔的问话中用语那么准确、犀利而又击中要害呢?”周恩来一听哈哈大笑说:“在马歇尔发言时,我就基本能听懂他说的意思,再经章文晋翻译一遍,我再吸上两口烟,就有了足够的思考和组织语言词汇的时间,所以回答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1970 年 11 月 12 日,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进行长时间会谈后,又不得不接着会见到访的罗马尼亚对外贸易部部长布尔蒂卡。在谈话中,他告诉布尔蒂卡,中国政府对外援助有两条原则:第一,借款不要利息;第二,我们不做军火商。这时,周恩来显得十分疲倦,已经到了昏昏欲睡的状况,可是面对国际贵宾,他又不得不强打精神,强撑身体,于是伸手要了一支烟。周恩来一边抽烟一边还对布尔蒂卡说:“我困得不得了,只好抽烟。现在,即使我不跟你谈话,我也不能睡觉,还要做别的事情。”



国、资治通鉴、古代词话、古文观止,犹如石上清泉荡涤心中尘埃,犹如绿湖白莲感悟高尚纯洁的品德,犹如群峰矗立赋予我挺拔正直的人格。

令我神醉心迷的茶香、烟香与书香中,我找到人生登攀的高度。人生难得痴迷,难得一醉,我愿意让茶、烟、书酿造出浓浓的芳香,伴我度过每一个春夏秋冬。

的,只要说是某某人的儿子,就既不需要排队,也能称到最好的肉,这是我亲身体会的事实。

父亲曾经跟亲朋好友开玩笑,这辈子是不可能戒烟的。因为只要不抽烟,就浑身不自在。有时候熬夜工作,还需要用“黄鹤楼”烟来提神,就这样一直与“黄鹤楼”烟相伴相随……

现如今,作为在烟草部门工作的我,有感于“黄鹤楼”是有一个追梦型品牌,其“淡雅香”品类为行业提供了一个品类创新的崭新范式。所以更常以千古名诗《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为寄托,或在每年的清明及祭奠日,我都会点燃一包“黄鹤楼”烟,等烟袅袅飘渺的,然后与天堂的父亲对话……



图为洪德路 8 号大院,民国“东亚烟厂”的旧址。

民国“广州制造”曾取代英美卷烟

■ 廖靖文

广东第一家机器卷烟厂 见证民族烟草工业发展

清代晚期,随着大量外国资本、西方商品及技术的输入,中国走上了近代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广州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先驱,1845 年在广州建立的柯拜船坞,是我国最早的近代船舶修造工厂。洋务运动兴起后,除了洋人开办的工业企业外,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民族资本等多种工业企业在广州全面开花,近代工业建筑也陆续在广州出现。

与民用建筑相比,工业建筑的质量普遍良好,安全系数大,不少拥有近百年历史的近代工业建筑不仅保存较好,还在继续发挥着作用。

大基头,这个位于河南(海珠区)西北角的地名在广州城建史上是重要的地标,其位于滨江西路南侧,南接洪德路北端,因原是珠江南岸堤基的西端而得名。大基头两侧都是传统的骑楼建筑,上世纪 20 年代,河南最早修筑的南华路就以大基头作为西端起点,整个片区是广州保存最好的骑楼街和清末民居,生活气息浓郁。很难想象,在民国时期,一座机器轰鸣的卷烟厂就在这片骑楼后生产出广州的相当大部分香烟,它的旧址完好保存在洪德路 8 号大院内。

一家三兄弟 同开卷烟厂

这座三层高的建筑颇像一座办公楼,一楼的连廊简约而不失气派。此前两年,这里曾经是一家知名潮流服饰品牌的总部。除了楼梯入口早年曾作更改外,建筑的格局与昔日大体一致。虽然大楼是砖木结构,但建筑质量十分优良,用作支撑的梁柱木料大都完好,楼梯、阁楼和墙壁仍然光洁坚固。

陈晓平是民间文化团体“河南地文化学社”的负责人,他和学社成员曾经对 8 号大院的建筑进行过一番考证,确认其是民族资本家简英甫开办的东亚烟厂(前身是“中国烟厂”)的旧址。

对于简英甫的名字大部分人都很陌生,但他的两位兄长却是大名鼎鼎:广东南海人、创办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著名实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作为我国民族工业的一面旗帜,是当时唯一可以与英美烟草公司相抗衡的民族卷烟企业。

笔者翻查了《广东大事记》和《广东烟草志》,其中记载民国 16 年(1927 年),简英甫脱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广州泮塘设立中国烟厂,是广东第一家机器卷烟厂,后改为华南烟厂。当时正值广州成立国民革命政府,国产卷烟曾一度取代英美卷烟。后来,在泮塘创立的中国烟厂搬迁到大基头,改为东亚烟厂。

20 年间几易其主

东亚烟厂及其前身“中国烟厂”在成立不到 20 年间,几经更名,历经英美烟草垄断、日军强占等坎坷,是 20 世纪初到中叶民族烟草工业发展的缩影。

在存世的史籍中,相比起两位兄长的爱国华侨、民族实业家的光辉形象,中国烟厂创办人简英甫被提及的多是生活奢侈,与兄长也日生嫌隙。1927 年,简英甫利用与宋子文的特殊关系,在广州泮塘豆腐店设立中国烟厂。

日本侵略者攻占广州以后,强占中国烟厂,并把它搬到河南海天四望,改为“日本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广东出張所第一工场”,利用英美、上海香烟断货的时机大发其财。1945 年广州光复,国民政府将东亚烟厂拍卖,新股东继续维持生产。

据 1947 年《实业导报》介绍,东亚烟厂生产“骑骆驼牌”和“帆船牌”香烟,有员工 400 多人,有卷烟机 13 套,产能可达到每天 130 箱,产量占全市的三分之一。但由于政府受到英美压力,放任外国香烟免税进口,东亚烟厂销路受到极大冲击,到 1947 年下半年,只能维持 7 台机器开工。

广州解放后不久,东亚烟厂改名南方烟厂,后来卷烟业务合并到广州卷烟一厂。此后的半个多世纪,这座大楼曾经做过生产车间和办公楼。目前,租户计划将这里作为艺术展览用途使用。